

连云港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11236/11

连云港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 我的自述……………孙笃生(1)
- 朱爱周烈士事略……………朱其铠(26)
- 吴辟初先生的抗日业绩……………孙树林 廖寿康等整理(34)
- 回忆抗日战争二、三事……………熊正文(42)
- 悼念抗日烈士部分挽联……………杨竹铭辑录(48)
- 沈云沛与苏北沿海开发……………张传藻(50)
- 海、灌分治缘由……………尚爱民(58)
- 我在新浦创办聚兴铁工厂的经历
……………王鉴秋口述 张崇山整理(60)
- 新浦馨祥墓园……………核筱亭(70)
- 抗战胜利后的海州灯范……………张匡华(77)
- 解放前二十五年的板浦中学
……………汪启棕 陈 扩 何亨之(83)
- 烽火桃李……………徐孟依 吴逸云 顾九卿 廖寿康(91)
-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东、灌、沭三县中学
- 义德医院始末……………孙济仁(97)
- 海属名中医周藩西……………阎鸿都(104)
- 北洋军阀白宝山在海州
……………邵镜波口述 杨东野记录整理(109)

我的自述

孙笃生

予年老体弱、耳聩眼花，行动不便，离休最佳。然壮心犹存，不安闲散，脑力尚好，爱思索，回顾往事，历历在目。生平坎坷，进退得失，择其要者，理成脉络，见诸文字，以请鉴察。

一、叛逆旧营垒

孩提时代。记得我父亲孙壁如在大地主孙海山家当家问事，相当于管家先生。家中又有田三百亩，在当地算是中小地主，全家生活平常，粗茶淡饭，但我父亲一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地主还高，且有恶习，抽鸦片、赌博。他抽的鸦片一定要英国进口的，赌博经常通宵。他的吃喝是厨房专做，本人又很挑剔，简直可以说是食不厌精。父亲为人十分冷酷，对孩子从无笑脸，话也极少。母亲贤良。在旧社会，我对父亲只能逆来顺受，唯一的作为只不过是请家族中的权威者来保护子女的利益。由于我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和当地地主家的孩子们有交往，因而常看到佃户到地主家去，既不能坐，也不能站，只能半蹲半跪在门槛上。就这样还不能直接和地主老爷说话，要对管家先生讲，管家先生稍有不满意，就毒打佃户，甚至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这些在我童年时代刺激很深，对地主的行径非常愤

慨，对管家先生亦很痛恨，常骂他们为富不仁。因此，在家中得不到父亲的喜欢。我们兄妹三人中数哥哥最受父亲宠爱的，他吃剩下的东西就喊哥哥去吃。每当这样场合，母亲就将剩下来的东西分成三份给我们兄妹三人，小妹不吃，就分给我们两人。但这种事要在厨房内进行，不能让父亲看到。

我十三岁（1911年）那年，父亲辞去了管家的职务，将地收回（即夺佃），自己雇工耕种，并指定我跟着长工学种田，让哥哥去读书。对此分工，我无力反对，只有服从。种田并不难学。我十三岁时对重活力不承受，但基本活路还可以做。到十五岁，熟能生巧，就可以和长工一样干活了。由于父亲生活上挥霍无度，在我种田的三年内，田已被卖掉了六七十亩。照此下去，不到十年田就要被卖光，我学会种田，到时已无田可种了。自己没有田种，只能当佃农，租地主的田种，每想到佃户在地主家受到非人虐待，令人不寒而栗。故竭力想另找一条出路。我家所在的张店镇有一所完小，校长孙青，平易近人。我便到学校对他说：“农田半年闲，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来上学，多用点功，能跟上班吗？”他说：“可以。小学的课程不多，将来升学、做事用得上的也就是国语、算术、常识几门，你多用点功可以跟上。”于是我就直接向他提出念书的要求，请小学接收，孙校长欣然同意了，并嘱我和家中谈好后即可上学。我回家后将此事对母亲一说，她满口应允，并和我同去对父亲说：“农田半年闲，地里该做的活全做、闲下来去小学念书，保证不耽误农时。”父亲说：“不行！”母亲说：“二桔子（我的小名）地里的生活照做，闲下来才念书，不要你出一个钱，还不行吗？”

经过反复争论之后，才勉强同意我上小学。一来我年纪较大，上小学已经十五岁，故刻苦努力，二来农闲时全力读书，农忙时也抽空学习。所以，完小的课程，我只用四年时间就全部读完了，而且功课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

小学毕业后有二十多人相约投考海州省立第八师范，我又背着父亲前去报考。幸运得很，二十几人唯我一人被录取。这本来是喜事，但父亲得知后大为震怒，不准读书。我的表叔商振兴来说情：“去投考的二十多人，只取二桔子一人，为什么不给去念书呢？”父亲说：“留下种田。”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母亲支持我去读书，但在家中无权，也无计可施。我父亲兄弟五人，他是第三，四叔孙灿如住在王马庄，对父亲可能有影响。母亲想来想去，一日下午去王马庄找四叔，告诉他，我考取第八师范父亲不许读书的事。四叔一听，翌日带了五十块钱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二桔子考上了第八师范，你怎么不给他念？你知道么，去了二十几个人只取了他一个。别人想念考不上，你家是考上了不给念，这是什么意思？”父亲默然无语。四叔接着说：“你供不起，我供他念！”说着就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这是五十块，足够念一年书。明年需要，告诉我一声，就叫人再送来。”说罢就走了。母亲送四叔走后将五十块钱收起，问父亲：“你还不给念吗？”父亲默然无声。就这样，我就到海州上了省立第八师范。毕业后在张店小学任教，旋即任该校校长。一九二六年父去世，丧事办完，债主们接踵逼债，都是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务，总计本钱八百多元，利息四百多元。家中幸有田近二百亩，全部抵押，差不多可以还清。我即打

算把地全部卖掉还清债务。当时我的好友李应，是大学毕业，学法律。一个律师，他不同意我这样做，力主我留下地产，债务由他负责处理。结果是他邀集当地名流和债主们达成协议，利息停止，每年由我在校的薪水还本。就这样，我留下了一百多亩地，后来我参加革命时将田地全部献给了当地人民。

一九二八年北伐胜利，蒋介石开始反共反人民，但蒋的反动政策尚未波及到国民党下层。三月间，我在八师的同窗好友汪宝宣回苏北，到张店找到我，谈话中，知道他八师毕业后已跻身于政界，这次是作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到地方上来组建国民党的。当时他给了我一本《三民主义》，叫我先看看，改日再详谈。汪去后我立即阅读《三民主义》，感到三民主义确系国家强盛的纲领。汪宝宣第二次来时，我真诚地对他讲了阅读体会。他见我对三民主义如此诚笃，遂对我说：“国民党的纲领就是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兄弟这次来到这里要组织灌云县党部，你填个表，算我发展的国民党员。”基于对三民主义信仰和对老同学信任，我填了表，参加了国民党。随后汪又给了我几十张表叫我发展党员，我表示照办。七月，汪要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来信叫我去县城板浦。他在板浦对我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主持县党部工作不适合，先到农会当县农会主任，你看如何？”我说：“行！给我做一点具体工作就行了。”这样我就当起了县农会主任，月薪四十元，住在县党部。国民党根本不重视农会工作，下面农会组织不起来，没有事做。

一九二八年秋，汪宝宣两次带信给我，叫我去镇江参加国民党区长训练所受训，然后回灌云当区长。我当时感

到农会工作尚未做好，应当好好干，为家乡农民做点好事，不想去受训，便以此为由复了汪的信，汪随即直接给灌云县长一信，叫我即刻到镇江报到，并随信带来二十块钱做为川资，不得已，我便去镇江受训。受训期间曾去上海一次，长期蛰居苏北穷乡僻壤，第一次到上海，自然目不暇接，但有一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一日，到外白渡桥，看到日本浪人毒打中国人力车夫，最后推入苏州河中，中国军警居然视若无睹，不闻不问，这种事情和满清、北洋军阀的统治有什么区别？我隐隐感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区长训练所，开始汪宝宣待我还好，象老同学、老朋友，在我进入训练所之后，他即摆起官架子，对我不理不采，他常到训练所讲话，每次都是车来车去，看到我就象没看到一样，昂首而过，这对我的自尊心刺激很深，从个人感情上开始对国民党不满。一九二九年三月在训练所受训毕业，汪发请贴，请家乡几名受训者赴宴，我拿到请贴后表示不能赴宴，引起不少人莫名惊诧，纷纷问我：“论个人关系，你和汪比我们和汪深得多，你为什么不去呢？”我说：“请诸位转告，我要回去了，不能等赴宴，实在抱歉！”从此，我和汪的关系逐渐疏远，直到后来断绝了往来。

受训结束后，我回到灌云县三区当了区长，八师同学钱天素已加入共产党，并在他家乡沐阳发展不少党员，和灌云县的共产党员孙海光、孙德林、封培乾等人也有些联系。这时，我对国民党的腐败已有所认识，对共产党也有所了解。钱天素是我的老同学，过去关系很好，彼此品行也十分了解，故他直接对我讲，要我掩护他从事地下活动，我即让他当张店小学校长。该校不少学生后来成为负责干部，

如孙桂儒、朱万国、孙曙等同志。我上任初期，钱天素同志叫我负责灌云地下党孙海光、孙德林、封培乾等同志的安全，我一一照办。我当三区区长，本区不少大地主送钱给我，多的有四五百元，最少的也有八九十元，总数约有数千元，被我一一谢绝了。天素同志得知这事后问我：“地主送钱给你为什么不要？”我说：“非法收入即属贪污，我最痛恨贪官污吏，不能接受这种非分的钱。”天素说：“你这个呆子，国民党了更有一个干净的吗？你收进来供地下党用嘛！”我说：“地下党的费用不成问题，我现在家中有地一百多亩，收入可供全家生活，我的薪水每月六十块钱，够你们用了。”一次，我去上海，我给他200元作为活动经费。灌云县三区在我任区长期间，税收采取累进税办法，即收入越多税收越高，这样，地主越大则摊派的税款越多。当地大地主杜养禾有地四万多亩，应缴税款很多，他对我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他花钱到省里活动，诬告我收大烟税（大烟是我们家乡对鸦片的俗称），省里撤销我的区长职务，文已到灌云县，县长找我谈话，我表示，收大烟税一事绝对没有，如查出愿受任何处分，若查无此事，我要到省里去弄个明白。县长为息事宁人，劝我在省里来文未公布之前辞职，要我用灌云县的两部汽车去开办汽车公司。我将此事告诉天素同志，他认为这满好，有自己办的公司，可以掩护地下党活动，我随即辞去区长职务，着手开办汽车公司，这是我向旧营垒诀别，走向革命的开始啊！

二、走向革命

辞去国民党区长职务，立即着手开办连云汽车公司。

钱天素同志对我说：“办汽车公司，可以大一点，多掩护一些地下党员，你在灌云县有声望，向本地的大地主招募股子总有办法，有七八千块钱到上海买旧车子可以买好几部。”我欣然同意，积极筹集资金。我自己有积蓄一千多元，通过当地著名士绅吴月波和杜石华招募了七千多元，统统交给天素同志到上海去买汽车及零件。吴月波是当地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一贯同情和靠拢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任淮海区参议长，全国解放后任江苏省粮食厅厅长，一九六四年逝世了。

一九三三年夏，钱天素、朱勋池去上海买汽车和零件，同时雇用开汽车的工人和修汽车的工程师。这些事情很快办妥，即正式营业，其路线是板浦——响水口——东坎。灌云、沐阳两县的地下党员及靠近党的进步青年，如钱天素、汤良谦、吴泉友、王亚东等都在公司工作。钱天素在营业部，汤良谦在售票处，吴泉友、王亚东等都在技术部，其他同志我记不清楚了。当时苏北的交通十分落后，汽车公司营业不断扩大，每年除开销外还可盈余千元，二年内陆续归还地主入股三、四千元。后来剩下没有归还的股份，他们都表示不必再还，算是送给汽车公司。灌云、沐阳地下党不少同志在公司工作，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青壮年走向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如朱勋池、武天孚等都成为我党基层干部。

大约在三七年春，沐阳的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姓董的到灌云县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说连云公司卖票的汤良谦是沐阳的共产党，灌云县立即把汤良谦逮捕了。等我知道时人已关押在国民党灌云县政府。天素同志要我设法营救，我立即前往灌云县政府找到县长许协葵，很礼貌地问他：

“听说贵府下面有人把敝公司一个卖票的抓来了，不知此事是否确实？一来我打听清楚，二是来向父母官谢罪，是我管教不够！”许说：“听沐阳来说汤某是共党，要我们抓起来送去，眼下还在我这班房里。”我故作惊讶：

“啊！是共产党，确有证据吗？”答：“没有确证，只是沐阳来说他是，是供出来的。”接着他转向我低声说：

“笃公，因为你不是共产党，我才如实相告，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东三省侵占中国地盘，传说共产党方面又提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局势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啊！”见他如此，我感到他对逮捕并不坚决，只是碍于邻县的关系，于是我说：“我原先当区长，后来有人诬陷我，县长劝我主动辞职，去开办汽车公司，公司又在县城，你对我是了解的。现在公司缺少职员，沐阳方面又提不出确证，你看汤良谦可不可以交保释放？如查出他在本县确有共产党的活动，请沐阳来抓我吧！”经我这样一谈，再加上许本人有民族气节，我公司对他经济上也有支持，不久，汤良谦就获释了。随以公司去上海购买器材的名义，安全转移了。

西安事变后，被国民党逮捕的孙存楼同志获释到灌云县城板浦，来我家找我。他是我的本家，从小就熟，感情很深，一见面自然十分欣慰，我请他把坐牢获释的经过讲给我听，他说：“芦沟桥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经过我党的努力，被国民党监禁的政治犯已有不少释放了。我在家乡已住了一段时间，这次来找你商量一件大事。”我忙问：“什么事？”他接着说：

“我看你把汽车公司结束掉，用这一笔钱买枪，在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我一听，正合我的意思。“好！中国人

是要起来抗日的。我是苦于没有人来发动组织，钱天素是沐阳人，在我们家乡的声望不高，你来了就行了。我马上结束汽车公司，和你一起回去。”存楼说：“也不要急成这样，我先回去和武永嘉、德林他们先筹备一下，你这里结束后再回去，最好利用你的关系，争取灌云县承认我们组织的游击队，以解决吃饭问题。”我表示同意，他即行回家乡去了。他所说的武永嘉、孙德林都是我的同乡、地下党员，有他们去筹备是万无一失的。

送走存楼，我即和天素谈及此事，由于我们平时对抗日一事交谈甚多，组织武装也是共同愿望，只是一时定不下地区和缺少骨干，存楼的一席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我们很快作出决定：立即结束连云汽车公司，组织游击队抗日！

三、抗日第一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决定结束连云汽车公司，当时正是运输旺季，朱勋迪、武天孚等同志找我说：“现在正是运输旺季，一天下来收入几百块，马上结束，经济上损失太大，不如到冬天，运输清淡了再停业好。”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结束汽车公司干什么吗？是用这笔钱去买枪、买子弹，到家乡去组织游击队打鬼子的。现在是抗战第一，一天也不能拖了，马上结束！”这样，他们也就没有再说的了。当时我想，他们几位有这种想法，其他人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将来组织游击队，这些人都是用得着的，事先得跟他们讲清楚。于是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告诉地下党的同志和关系密切的人，抗日我是下了决心的。”

我在国民党当区长时到过上海，亲眼看到租界的花园牌子写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亲眼看到日本人打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现在结束汽车公司是去拉游击队抗日，无论多少钱也不要了。立即去抗日，要抗日，还是请共产党来领导，国民党是不行的，我的家乡张店镇只有四五百户，有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前不久就有两人携枪逃出，开了小差，回来后把枪卖给我。你们看这样的兵怎么抗日，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人，假若有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是一定会胜利的。不久，连云汽车公司就顺利结束了，我和钱天素、吴泉友、朱勋池等人回到家乡，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将汽车公司的全部资金都用于购买枪枝子弹。天素同志批评我道：“你留几个钱过日子！现在都拿去买枪，将来你还能卖枪吗？”我说：“到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随便给我点事情做做就行了，我卖枪干什么！”当时因为初建，游击队没有正式番号，开始就叫孙氏大队，我挂名大队长，实际工作都是孙存楼、孙德林、孙良浩、钱天素、武永嘉他们去做的。这样维持了半年左右。

为了争取抗日的合法地位和解决给养问题，共产党员孙存楼、武永嘉等同志又一次提出利用我在灌云的社会地位去找县长洽谈，争取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大约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找到了灌云县长吴春科，开门见山对他说：

“现在日本人入侵中国，战事已波及江苏了，不久很可能波及灌云。我是国民党员，现在我党已正式宣布，领导全国同胞抗日，我拥护抗日并愿为抗日出力。我在灌云县三区，我在家乡还有一点影响，打算在当地组织抗日游击队，保卫家乡。人和枪都不成问题，地方爱国青壮年很

多，我若出面组织，他们肯定会参加的。枪械我已有准备，武装游击队是绰绰有余的”吴春科边听边以“好、好”应付，最后我说“组织起游击队，请县政府给一个名义，供应给养，领导抗日。”吴春科迫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势，又想拉拢本地人，哼哼哈哈一阵之后，一口答应三区成立抗日武装，定名为灌云县三区抗日基干队，委我为大队长，发给给养，集中训练。一九三八年春，我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手续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基干队选择大前庄的大地主孙××家作为集中训练的地点，除原有的人外，附近的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少数农村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参加，很快发展一、二百人。我任大队长，政治课主要由孙存楼、武永嘉上，军事课有范懋修等同志上，因为他会武功，讲讲攻防动作是可以的。

基干队的训练管理，都学习八路军。当年的成员，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吴书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存楼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方立凡同志也是在十年动乱中受诬陷被活活打死，……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这些幸存者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宣传他们的事迹，以团结一致，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我的出生地张店镇，是一个热闹的小集市，镇上有不地主、商人建的瓦房，镇西边有一条南北向的盐河，是盐业运输的水路主线。一九三八年秋，日寇轰炸县城板浦，县政府曾迁到三区颜马庄。不久，日寇又在连云港登陆，迅速占领全县主要城镇，为使游击队能够活跃在盐河两岸，阻止日军进驻张店镇和迫使敌人不在张店建立伪政

权，我们拆除了张店所有瓦房，镇压资敌的民族败类。为使别人无话可说，我首先拆掉自家的瓦房。日伪军欲在张店建立伪政权，有一些民族败类想出来当伪镇长，谁出来我就派人去抓来镇压，并公布罪状，我们先后击毙孙运如、孙光如、孙乔如、陆二马、其中孙运如是我的近房堂叔。采取这两项措施，使日伪政权迟迟不能建立，游击队在张店附近都很安全，河东河西往来也很方便。

国民党蒋介石表面上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但实际上是消极抗日，极积反共。一九三八年秋，吴春科得到特务的密报说。“大前庄基干队是共产党孙存楼搞的。”即下令解散基干队、取消番号，停发给养。但这难不倒我们。经过一些变动，我们仍然活跃在盐河两岸，吴春科却暴露了反共的真面目，向他告密的那个特务后来被我们镇压了。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县长谢廷升，知道我所领导的游击队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他求援于国民党上层，派蒲开喜旅来消灭我部，只因交通不便，要等船运送蒲开喜的军队，当时吴月波同志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到冯辛齐送信给我，要我防范。我得信后和存楼、德林、良浩他们商量，认为蒲开喜旅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于游击队，硬打是不行的，谢廷升的目的是抓我，认为抓到我就等于消灭了游击队。鉴于这种情况，大家劝我暂时隐蔽一、二个月，待苏鲁边区八路军南进支队过来，建立了根据地，再派人接我回来。到什么地点呢？我想到了同乡、同学邱梦麟，他在泰州任国民党县长，为人忠厚，有正义感，和我来往甚密（此人解放后定居上海，一直是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于是，存楼、德林、良浩同意我去泰州暂时隐蔽，

并主动提出照料我的家庭，我就在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间告别八十高龄的老母和妻子儿女，只身前往泰州。

四、入党前后

在泰州约两三个月，听说八路军已挺进苏北，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八月间，地委正在开会，德林、良浩派人接我回到灌云，组织上已决定我担任抗日民主政权——东灌沭办事处主任，叫我立即接谈。谈话中，地委负责同志金明指示我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支持抗日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同时说明现在干部很缺乏，干部配备要我和地方党组织商定，可以和张克辛、钱天素、汤若瑜等同志研究。旋即组织了抗日民主政权，由共产党员汤若瑜任秘书（后为钱天素同志）负责党的领导，朱勋池、潘厚卿、陆厚府等任科长，因我还未入党，上级党委的指示都由秘书传达贯彻，一切行政工作完全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办、一刻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一九四〇年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我的家乡也已沦陷，民族矛盾极为突出，国共两党只是形式上的合作，因此抗日民族战争是我党全盘工作的中心。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也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支持抗日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苏北的淮阴、东海一带建立的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管辖八个县，灌云县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改东灌沭办事处为灌云县政府，我任县长。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是新四军三师的部队，地方政权的一大任务就是征收公粮，保证部队给养。灌云地区是淮海

区八个县中土地最肥沃的，征粮也最多。部队后勤部驻李恒庄，县政府驻高庄，相距约五华里。在运输极为落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就地征粮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那时，我们根据地中心，政权机关比较健全，征粮工作亦不成问题。边缘地区不大健全。在边缘区日伪军安上据点，不时出来骚扰，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踊跃纳粮、支援抗日战争。广大雇农，包括中农，因土地少，农具缺，人力畜力不足，手中粮食有限，而地主、富农拥有大量土地，农具多，资金足，粮食多，所以，只有征足他们的公粮才能充分保证供应。当时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对地主、富农不能采取强迫的办法，只能利用关系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赴国难，鼓励地主、富农以及其他上层人士为抗日战争作贡献，做开明士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南岗区地主、淮海区参议员吴辟初先生带领本乡武装，与日伪军英勇作战壮烈牺牲。迫于民族危亡的形势，我党的政策正确，经过我们做工作，他们愿意纳粮，中心区的征粮非常顺利。灌云县的开明士绅有不少对抗抗日战争出过力，做了好事，一直跟党走，接受党的领导，为党工作。吴月波同志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解放后他任江苏省粮食厅厅长，直到逝世，始终如一地为革命出力流汗。只有少数在解放战争中投靠了敌人。

边缘区，日伪军安了据点，征粮很困难。我建议上级派部队来投掉，地委同意后即派一个团到灌云来拔掉灌东据点。每次战斗，团长都叫我和他在一起，我说。“我到前面去，我熟悉情况，对战斗有利。”他说：“你告诉清楚就行了，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地委交待我们要负责你的安